

# 敦煌學

## 第三十九期

- 山本孝子 書儀與書札之間——編纂步驟、性質及內容的再認識  
朱玉麒 高昌童謠與唐代西域的戰爭  
余 璽 敦煌行腳僧圖中的遊方僧人及其神聖敘事考  
林仁昱 敦煌「五臺山讚歌」之寫卷樣貌與應用研究  
馬小鶴 妲厄娜 (daēnā) 與電光佛  
劉鐔靖 論敦煌本地論學派義章文獻之「一乘」詮釋

### 變文研究專題

- 荒見泰史 《葉淨能詩》與葉淨能  
張小豔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  
陸穗璉 敦煌變文所見的夢象及其運用

### 書評

- 王三慶 楊秀清著《唐宋時期敦煌大眾的知識與思想》讀後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3年8月

# 敦煌學

第三十九期

汪娟 楊明璋 主編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3年8月

# 《敦煌學》第三十九期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汪娟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張廣達 陳懷宇 項楚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汪娟 楊明璋

---

##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之中文稿為限。
- 三、來稿須經二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特約稿除外。
- 四、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Word 相容之完稿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如有附圖，請儘量另附 300DPI 以上高解析度之 JPG 檔。
- 五、來稿請附論文篇名、300-500 字摘要、3-5 個關鍵詞(皆須中英文)，另附主要參考文獻。投稿著作者之署名、工作單位、職稱(皆須中英文)，及通訊資料。
- 六、撰稿體例請自行參考：<http://nhdh.nhu.edu.tw/2-1.htm>，點選「研究論著」。請務必依本刊「撰稿體例」撰寫，以利作業。
- 七、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八、作者如投稿本刊並經收錄後，即視為同意本刊授權合約機構：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增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或電子書，並規劃成權利產品（或服務），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區域網路、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等使用行為。
- 九、來稿內容涉及著作權問題（如：圖表與長篇之引文等），請作者事先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情事，文責自負，與本刊無關。
- 十、投稿本刊論文，請將 Word 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各一份，逕寄至電子郵箱：[dunhuangxue.nh@qq.com](mailto:dunhuangxue.nh@qq.com) 或 [dunhuangxue.nh@gmail.com](mailto:dunhuangxue.nh@gmail.com)。

## 敦煌學 第 39 期

---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dunhuangxue.nh@qq.com 或 dunhuangxue.nh@gmail.com

主編：汪娟、楊明璋

副主編：梁麗玲

執行編輯：廖方瑜、朱怡璇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023 年 8 月

---

ISSN 1015-9339

## 目次

書儀與書札之間——編纂步驟、性質及內容的再認識-----	山本孝子	1
高昌童謠與唐代西域的戰爭-----	朱玉麒	23
敦煌行腳僧圖中的遊方僧人及其神聖敘事考-----	余 曩	45
敦煌「五臺山讚歌」之寫卷樣貌與應用研究-----	林仁昱	71
姐厄娜（daēnā）與電光佛-----	馬小鶴	103
論敦煌本地論學派義章文獻之「一乘」詮釋-----	劉鐔靖	131
《葉淨能詩》與葉淨能-----	荒見泰史	169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	張小豔	193
敦煌變文所見的夢象及其運用-----	陸穗璉	231
書評：楊秀清著《唐宋時期敦煌大眾的知識與思想》讀後----	王三慶	263

## Table of Contents

The Way of Editing Shuyi and Writing Letter-----	-----YAMAMOTO Takako ----- 1
“Gaocang Tongyao” and the War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	-----ZHU Yuqi ----- 23
The Origin and Sacred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lking Monk in Dunhuang Xing Jiao Seng Art -----	-----YU Zhao ----- 45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unt Wutai Hymns” of the Manuscripts’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	-----LIN Jenyu ----- 71
Daēnā and Lightning Buddha-----	-----MA Xiaohe -----103
The Interpretation of “ekayāna” in the Yichengyi Literature of the Dunhuang Dilun School-----	-----LIU Tanching -----131
<i>The Wizard Yeh Ching-neng</i> and <i>Ye Jin-neng</i> -----	-----HIROSHI Arami -----169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ai Zi Cheng Dao Jing</i> and <i>Xi Da Tai Zi Xiu Dao Yin Yuan</i> -----	-----ZHANG Xiaoyan -----193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ream” in Dunhuang Bianwen -----	-----LU Suilien -----231
[Book Review] Meditation after Reading Yang Xiuqing, <i>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Dunhuang Peop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i> -----	-----WANG Sanching -----263

# 高昌童謠與唐代西域的戰爭

朱玉麒\*

## 摘要

唐代前期經營西域的西征，是邊塞戰爭的一個重要單元，貞觀14年（640）平定高昌，則是西征戰役的開局。在這一被命名為「交河道行軍」的戰爭中，唐軍做了充分的準備，使用了較多的戰術，以〈高昌童謠〉為代表的心理戰術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西域經營的首戰經過，討論心理戰的文化背景，為認識唐代西域的歷史提供一個新的切入點。

**關鍵詞：**唐前期、經營西域、高昌童謠、心理戰術、文化背景

---

\*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系教授。

# “Gaochang Tongyao” and the War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ZHU Yuqi\*

## Abstrac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westward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rder warfare. The conquest of Gaochang (Turfan) in the 14<sup>th</sup> year of the Zhenguan Era (640 A.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ward expedition. The Tang army fully prepared for this war named “Jiaohedao Xingjun (i.e., a March to the Jiaohe Road)”, and used many tactics. The psychological tactics represented by “Gaochang Tongyao (i.e., nursery rhymes in Gaocha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is war.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irst war in the process of ruling the Western Regions by the Tang Dynasty, discuss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provides a new ent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rul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Gaochang Tongyao; psychological tactics; cultural background

---

\* Professo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 一、唐平高昌的戰爭經過

平定高昌的歷史書寫，正史記載以《舊唐書》為最詳備，其中〈高昌傳〉記載平定高昌，條理清晰，以下依次分三個階段，略析經過。

### （一）宣戰

首先是關於戰爭的緣起，〈高昌傳〉作如是說：

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又與葉護連結，將擊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書切讓，徵其大臣冠軍阿史那矩入朝，將與議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尚隱蔽之。又尋與西突厥乙毗設擊破焉耆三城，虜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訴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其狀。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國中署置官號，準我百僚，稱臣於人，豈得如此！今茲歲首，萬國來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塹，預備討伐。日者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又西域使欲來者，文泰悉拘留之。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自為可汗，與漢天子敵也，何須拜謁其使。』事人闕禮，離間鄰好，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明年，當發兵馬以擊爾<sup>1</sup>。」

以上記載，是歷代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必然途徑：尋找西域小國的種種離心離德行徑，為出師張本。在這裡，通過第三者的敘述和唐太宗的直接引語，表達各種「無藩臣禮」的行為：阻絕西戎朝貢也脫略自身朝貢、勾結突厥共同欺負鄰邦、拘留逃亡而離間鄰好、署置官號而分庭抗禮、增城深塹而預備討伐。以上種種行徑，屬於「惡而不誅，善者何勸」，正義之師的征討理由得到充分確立。

### （二）備戰

接着，〈高昌傳〉記載了戰爭的啟動經過：

<sup>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 198（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5294-5295。

是時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向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令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稱疾不至。太宗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時公卿近臣，皆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絕域，縱得之，不可以守，競以為諫，太宗皆不聽。文泰謂所親曰：「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為憂也<sup>2</sup>？」

這裡有對興起戰爭的輿情記錄：勞師遠行，兵家大忌，反戰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從我方的「公卿近臣」到敵方的「麴文泰」，都表達了對這次戰爭中我方「勞而無功」以及敵方「以逸待勞，坐收其弊」的可能，可見並非穩操勝券。「太宗冀其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可能也包含著對必勝的擔憂、希望不用武力征服的目的。

不過，無論如何，征服西域看來是當時唐太宗不可逆轉的戰略，所以在「文泰稱疾不至」的情況下，他堅持出征，為此，出征的部署逐一出臺。

一是盟軍。外聯具有內陸戰爭經驗的西部遊牧部落參戰，首先是薛延陀：「薛延陀可汗表請為軍向導，以擊高昌，太宗許之。令民部尚書唐儉至延陀，與謀進取。」薛延陀是北方草原鐵勒諸部之一，在貞觀初年征服東突厥頡利可汗的戰爭中，被唐朝視為同盟而予以扶持，一度成為「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大部落皆屬焉」的漠北汗國<sup>3</sup>。所謂「西至葉護」，就是薛延陀的部落已經與西突厥葉護可汗的地區接壤，雙方差不多是隔著阿爾泰山而分界，所以，薛延陀部是最接近高昌國的一支生力軍。其二是「突厥、契苾之衆」，這裡的「突厥」當是貞觀4年被唐朝軍隊攻滅而降服的東突厥部落<sup>4</sup>。契苾則與薛延陀一樣，原來也是鐵勒諸部之一，貞觀6年由其首領契苾何力率部歸唐，被安置在甘、涼界內，以其地為榆溪州。契苾何力作為唐朝能征善戰的蕃將，之前曾率部參與過攻打吐谷渾的戰爭<sup>5</sup>。

<sup>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198，頁5295。

<sup>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狄·鐵勒》卷199下，頁5344。

<sup>4</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突厥上》卷194上，頁5159-5163。

<sup>5</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契苾何力傳》卷109，頁3291-3294。

二是布將。「乃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騎數萬衆以擊之。」侯君集是跟隨唐太宗李世民征戰四方的開國功臣，貞觀九年又被派遣作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李靖的副手，攻打吐谷渾而取得大捷。此次派遣與西邊游牧部落有作戰經驗的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並將曾經也參與平定吐谷渾的將領薛萬均作為副手，可見李世民的遣將調兵並非隨意指派，而是志在必得。

### （三）征戰

《舊唐書·高昌傳》最後記載了戰爭的發生：

（麴文泰）及聞王師臨磧口，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進趨田地城，將軍契苾何力為前軍，與之接戰而退。大軍繼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進逼其都。智盛移君集書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無幾，君其赦諸？」君集謂曰：「若能悔禍，當面縛軍門也。」又命諸軍引衝車、拋車以逼之，飛石兩下，城中大懼。智盛窮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sup>6</sup>。

戰事進行，比預想的要順利得多。侯君集的軍隊很快穿越了磧路而到達西域，麴文泰措手不及，發病而死。稍後，部隊攻下高昌國四郡之一的田地城，進逼都城，軍隊以衝車撞擊城牆、以拋車飛石城中，麴智盛在強烈的攻勢下，出城投降，高昌國滅亡。

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高昌；貞觀十四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九月癸卯，曲赦西州大辟罪。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十二月丁酉，侯君集俘高昌王麴智盛，獻捷於京師觀德殿<sup>7</sup>。」戰爭前後只用了一年的時間。

<sup>6</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 198，頁 5295-5296。

<sup>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太宗本紀》卷 3：「（貞觀 13 年）十二月丁丑，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帥師伐高昌」、「（貞觀 14 年）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殿，行飲至之禮，賜酺三日」，頁 50-52。

《舊唐書·高昌傳》還記載了在高昌置州縣，設立安西都護府，麴氏君臣及其豪右遷徙到中原，以及西突厥葉護可汗也懼而來降、唐以其地為庭州的過程，為此後的繼續西征奠定了基礎，這也應該屬於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即「善後」的內容<sup>8</sup>。可見《舊唐書·高昌傳》中麴氏高昌王朝的歷史，主要是圍繞著這場戰爭來撰寫，篇幅占據了全部〈高昌傳〉的四分之三以上。

## 二、唐平高昌的戰略戰術

### (一) 史籍記載

平定高昌戰爭的勝利，與唐朝對西征戰略的知己知彼和戰術的精密安排相關。《舊唐書》在這場戰爭的指揮者傳記中，也多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可補〈高昌傳〉對戰爭描寫的細節。如《舊唐書·侯君集傳》：

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頽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裡。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sup>9</sup>。

<sup>8</sup> 平定高昌後吐魯番盆地的歷史轉變，可參張廣達〈唐滅高昌國後西州的形勢〉，原載《東洋文化》68號，1988年，頁69-107，後收入張廣達《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14-152。

<sup>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侯君集傳》卷69，頁2510-2511。

這一部分，大概可以看到侯君集用兵在戰術上的三個特點。

一是詳細插敘了侯君集本該翻越柳谷而直搗都城，但是因為麴文泰出喪，放棄了直接的襲擊，體現了對唐朝「正義之師」的表彰。當然，這也與侯君集「穩操勝券」的戰備相關。

二是攻城戰術的針對性。因為麴文泰的葬禮，軍隊改道進攻田地城，〈高昌傳〉記載「契苾何力為前軍，與之接戰而退」，似乎接戰之後的結局並不順利，這也是可以預料到的：契苾何力的軍隊是騎兵，於攻城並非強項，因此迅速退下。但何以此後「大軍繼之，攻拔其城」？〈侯君集傳〉回答了這個問題：大軍改換了攻城戰術：用砍伐的大樹填平了城外的壕溝，用衝撞車損毀了城牆，用拋車石擊退了城上和城中的守軍。

田地城的攻城戰術可以當作平定高昌的試驗戰。奏效之後，攻打高昌都城的戰術，依舊如此，並且在城外設立了高於城牆的「十丈高樓」，指揮拋石的目標。《新唐書·薛萬均傳》記載：

（薛萬均）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sup>10</sup>。

從這簡潔的記錄，可知高昌城的指揮是薛萬均。但攻城戰術的方針，在出征之前就已經確立，《舊唐書·高昌傳》所謂「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可以認定唐軍在中原早就獲得了對於西域綠洲國家建置的信息，得以在出征之前即行部署攻城裝備。

而器械製造的指揮者，在《舊唐書·姜行本傳》中得到記載：

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率眾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曰：「攻戰之重，器械為先，將士屬心，待以制敵。卿星言就路，躬事修營，干戈纔動，梯衝暫臨，三軍勇士，因斯樹績，萬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豈足相況。」及還，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sup>11</sup>。

<sup>10</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薛萬均傳》卷94（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830-3831。

<sup>1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姜行本傳》卷5，頁2334。

姜行本是貞觀時期的將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陽二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賞賜甚厚。有所遊幸，未嘗不從。又轉左屯衛將軍」<sup>12</sup>，此次高昌之役，姜行本擔任副總管，主要是在進入西域之後利用當地資源，製作攻城戰具。攻城戰具的主體，自然是樹木，對於天山北坡具有豐富的松木資源，這可能早就在攻打西域的「情報戰術」中，為唐朝所熟知。

侯君集用兵戰術的最後一點，就是斷卻援兵。〈侯君集傳〉所謂：「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為表裡。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而〈高昌傳〉在平定戰爭之後也有補敘說：「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通和，遺其金帛，約有急相為表裡。及聞君集兵至，欲谷設懼而西走，不敢救<sup>13</sup>。」欲谷設是東突厥阿史那氏·始畢可汗之子，貞觀4年東突厥汗國滅亡後奔西突厥，於貞觀12年後自立為乙毗咄陸可汗。西突厥可汗作為高昌國強大的盟軍，這樣的重要情報應該也早為唐朝所掌握，因此，唐朝出征西域的軍隊有薛延陀、東突厥、契苾的參與，除了就近行軍之外，主要還有對抗欲谷設西突厥軍隊的備戰目的，因此，契苾何力在田地城攻戰中的前軍地位，並非平定戰爭的重要安排，契苾部的參戰，主要還是預設西突厥援軍到來時的未雨綢繆。果然，唐朝騎兵盟軍的參與，其震懾作用嚇退了西突厥的聯盟，這是高昌戰術另一個成功的用兵策略。

## （二）石刻證據

《舊唐書》分布在本紀和不同傳記中的平定高昌記錄，基本為我們復原了貞觀14年戰爭的經過和戰術，這與唐代史館搜集資料的程序直接相關。《唐會要》「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是一條經常被引用的信息，提供了後人了解唐代採集史料的方式。其中「蕃夷入寇及來降」的資料來歷，與高昌國之被平定後報請史館備案的方式相當，平定高昌詳細的戰爭記錄，應是得自當時的露布和「交河道行軍」凱旋後具報的實錄<sup>14</sup>。

而直接可以印證這些傳世史料真實性的出土文獻，是《姜行本紀功碑》。清

<sup>1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姜行本傳》卷59，頁2333。

<sup>1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198，頁5296。

<sup>14</sup> 宋·王溥《唐會要·史館》卷63（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089「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並報。」

代用兵西域，對於準噶爾的戰爭在翻越天山時，走在了漢唐西域戰爭的老路上，因此戰爭經行之地的紀功碑被陸續發現，與平定高昌相關的《姜行本紀功碑》就在那個時期被發現<sup>15</sup>。嘉慶年間的《全唐文》因此收錄了這一出土文獻，茲摘引相關文字如下：

昔匈奴殄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泯清，馬伏波樹銅柱之跡。然則振英風於絕域，申壯節於殊方，莫不騰茂實於千載，播芳猷於萬古者矣。……高昌國者，乃是西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自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肆豺狼之心，起蜂蠆之毒。若德聚庶，賊盛無已。聖上愍彼蒼生，申茲吊伐，乃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張行天罰。但妖氛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申九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右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衡智錫、左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侯郎將李海崖、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史王進威等，並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里紺所，未盡旬月，尅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川谷蕩薄，衝梯斲整，百櫟冰碎，機槍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大總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互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月，長戟擘雲霓，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sup>16</sup>。

紀功碑的發現，可以證明《舊唐書·姜行本傳》所謂「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的地點，是在巴里坤松樹塘。此外還可以印證的是，戰爭的動員令即對高昌國最重要的罪狀的擬定，是與《舊唐書》的記載一致的，就是勾結西突厥（「情懷首鼠」）和阻絕朝貢（「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而對

<sup>15</sup> 相關內容，參朱玉麒〈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輯，頁129-148，後收入朱玉麒《瀚海零縑：西域文獻研究一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32；《姜行本紀功碑》的討論，參朱玉麒《瀚海零縑：西域文獻研究一集》，頁15-20。

<sup>16</sup> 唐·司馬太貞《全唐文·紀功碑》卷162（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59-1660。

照《舊唐書·太宗本紀》，紀功碑中「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里紇所，未盡旬月，尅成奇功」的記錄，可知姜行本先遣部隊從貞觀 13 年 12 月朝廷命將出師以來，經行 5 月，抵達西域；完成攻城裝備，則在 6 月。由巴里坤行進至柳谷，再到攻略田地、高昌，8 月平定其地，置西州，不能不說是一次迅捷的戰爭。

從戰爭最終的勝利來看，唐朝的西征充分掌握了西域的情報，是一場情報戰，在此基礎上，唐軍就近徵發遊牧部隊的盟軍而阻斷高昌的增援部隊，就近製造攻城武器而使軍隊輕裝遠行，最終取得了平定高昌的首戰成功。《姜行本紀功碑》的發現，證明了「匈奴殄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的紀功碑形式，從漢代傳承下來，在高昌之戰後成為歷次西征戰役的規定動作。

### 三、〈高昌童謠〉的心理戰術

《舊唐書·高昌傳》在高昌城破的記載之後，還補充了兩個細節，一是之前已經討論的援軍欲谷設的「懼而西走」，還有一個則是高昌城中的童謠傳唱：

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sup>17</sup>。

無疑，這個記錄還是和戰爭有關，似乎是用「日月照霜雪」的比喻說明唐軍消滅高昌的輕而易舉。它似乎是在戰爭之後說明唐軍征服高昌的民心所向，但是，誰是這首童謠的作者呢？

#### （一）《新唐書·五行志》的誤收

此後，這首歌謠，在五代以來至北宋的相關典籍如《唐會要》和《新唐書》、《冊府元龜》中都有所記載。《新唐書》在《五行志》和〈高昌傳〉兩處做了記載，而且文本不同，體現了值得關注的歷史書寫現象。茲先述《新唐書·五行志》的文本：

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

<sup>1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 198，頁 5296。



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sup>18</sup>。」

與之同期的《唐會要》、《冊府元龜》、《樂府詩集》也都有記載，內容基本一致<sup>19</sup>。

《新唐書·五行志》的記載與《舊唐書·高昌傳》的文本基本一致，但是〈五行志〉收錄〈高昌童謠〉，卻體現了《新唐書》作者的看法，即認為這是屬於五行不調造成的災異現象。〈五行志〉延續了漢代以來「天人感應說」的王道政治理念，以災異現象來詮釋世事。關於戰事興起的災異產生，《新唐書·五行志》引用的《洪範五行傳》依據是：

《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變怪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訛言，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sup>20</sup>。」

〈高昌童謠〉因此被收錄在〈五行志〉的「詩妖」類中，毫無疑問將此童謠作為高昌國滅亡的天意表現。

自從《漢書》創設〈五行志〉以來，「妖言」記載層出不窮，與戰爭相關的童謠應驗，在歷史時期屢見不鮮，這無疑是〈高昌童謠〉在傳統文化中的遠因。元代的馬端臨也據《新唐書·五行志》將其採入〈物異考·詩異〉中，而前此同類文獻，可見傳統之一斑：

《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衽服振振，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犇。」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號，號公醜犇周<sup>21</sup>。

<sup>18</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五行二·詩妖》卷35，頁918。

<sup>19</sup> 宋·王溥《唐會要·高昌》卷95，頁1704（案：標點有改動）；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外臣部·亡滅》卷100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11575；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雜歌謠辭七·唐貞觀中高昌國童謠》卷89（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257；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309（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8372。《全唐詩》據此錄文而校以《新唐書·高昌傳》所引，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高昌童謠》卷878（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9941。吳玉貴《唐書輯校》卷4（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038，校：「迴首自消滅，《冊府》卷1000同，《舊唐書·高昌傳》、《唐會要》卷95『首』作『手』。」

<sup>20</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五行二·詩妖》卷35，頁912。

<sup>21</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sup>22</sup>。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sup>23</sup>。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sup>24</sup>。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卒為姚萇所殺<sup>25</sup>。

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sup>26</sup>。

唐竇建德未敗時，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sup>27</sup>。」

從〈高昌童謠〉體現出唐滅高昌的意象來說，它與上述童謠的表達方式如出一轍，因此被當做災異現象的「詩妖」看待，似乎毫無問題。

## （二）製造〈高昌童謠〉的心理基礎

但是列入詩妖的童謠似乎有一個特點，它必須是天意，是五行失調而自然發

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59。

<sup>22</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61。

<sup>23</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66。

<sup>24</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67。

<sup>25</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69。

<sup>26</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70。

<sup>27</sup>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五·詩異》卷 309，頁 8372。

生，而人為的謠言，不能算在其中。這種例外最明顯的，就是推翻第一個帝制時代的戰爭——陳勝吳廣起義的謠言，沒有被列入到五行災異的「詩妖」行列中：

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sup>28</sup>。

「大楚興，陳勝王」的狐鳴是非常接近於「詩妖」的謠言，但是沒有被後世列入〈五行志〉，是因為《史記》的書寫，直截了當地說明了吳廣的作為是在卜者的暗示下，人為的「裝神弄鬼」，是起義者利用民眾習成的敬畏災異的傳統而偽造，這是與〈五行志〉所追求的自然生成法的相違背的。

《新唐書》的編纂者從北宋留存的唐代史館文獻中看到〈高昌童謠〉這條資料，便采入〈五行志〉中，毫無疑問，他們相信這是高昌將滅的天垂災異。

但是我們需要質疑的是：《舊唐書》也纂修有〈五行志〉，也有「詩妖」，如高宗卒於嵩山下的童謠「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旁道打騰騰」，如武元衡被殺的元和小兒謠「打麥打麥三三三」轉身曰「舞了也」等<sup>29</sup>，均為與〈高昌童謠〉相似的內容。但是為何〈高昌童謠〉未被列入呢<sup>30</sup>？

筆者以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首〈高昌童謠〉其實是唐軍人為製造而散佈於高昌城中的謠言，與陳勝吳廣的「叢祠篝火狐鳴」之詞是同樣的作用，是唐軍平定高昌的另一個戰爭利器——心理戰術。與「大楚興，陳勝王」鼓動我方士氣的目的相反<sup>31</sup>，〈高昌童謠〉的作用主要在於瓦解敵方的意志，達到渙散軍心的目的，果然，這個目的還是極為成功的。當謠言在高昌城中出現的時候，

<sup>28</sup> 漢·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卷48（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950。

<sup>2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五行志》卷37，頁1375-1376。

<sup>30</sup> 中古正史〈五行志〉的書寫體例，可參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史料來源〉，《文史》2007年第4輯，頁77-91；〈「棄常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災異書寫〉，《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頁55-77。

<sup>31</sup> 「陳勝王」主要在鼓舞士氣，而「大楚興」也具有瓦解秦國軍心的作用，參見田餘慶〈說張楚——中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歷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134-150。

「文泰捕謠所發，不能得也」<sup>32</sup>，其後他「惶駭計無所出，發病而死」，雖然有兵臨磧口的近因，而更由於之前謠言四起的遠因。

所謂〈高昌童謠〉並不真的是高昌兒童的首唱，而是唐朝的先遣人員「候騎」即探子，預先進城用利誘的手法，教唆了這些孩子們把朗朗上口的謠言散播了開來。「候騎」在高昌戰爭中的使用，是有明文記載的，如前引《舊唐書·侯君集傳》的記載，在麴文泰死後，侯君集的大部隊到達高昌國北邊的柳谷，「候騎言文泰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sup>33</sup>，這是為強調唐軍系正義之師張本的，但是連麴文泰的喪葬時間都已經瞭若指掌，可見探兵早就在高昌城中埋伏已久。

《舊唐書》以唐代國史為基礎，正是因為〈高昌童謠〉是當時為人所熟知的一種戰爭方式，所以史館的〈五行志〉材料並沒有將其載入<sup>34</sup>。《舊唐書》在戰爭結束後補敘此條留言散播的信息，是否具有說明高昌滅亡是「天意」呈現的目的？我想可能是有這種企圖的，但是既然只是出現在〈高昌傳〉的戰爭描寫中，而不入〈五行志〉，則其時史官對「詩妖」的界定還是非常明確的。

《新唐書》在纂修過程中，由於對前朝往事的陌生，造成了史料的重新組合，〈志〉、〈傳〉出自不同的纂修者<sup>35</sup>，〈高昌童謠〉因此而在〈五行志〉、〈高昌傳〉中被分別記錄下來。

## 四、〈高昌童謠〉的文化背景

### （一）西域的漢文化割據政權

〈高昌童謠〉之所以能夠在平定高昌的戰爭中被利用，是與高昌國的漢文化背景相關聯的。

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盆地，是一個漢族移民社會，西漢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sup>32</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西域上·高昌》卷 221 上，頁 6222。

<sup>3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侯君集傳》卷 69，頁 2510。

<sup>34</sup> 據宋·王溥《唐會要·史館》卷 63，頁 1089，「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條，「天文祥異」亦均由「太史每季並所占候祥驗同報」，其中「詩妖」亦當如此。

<sup>35</sup> 宋·趙彥衛著、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卷 5（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84：「本朝脩唐書，曾魯公提舉、歐陽公分脩帝紀，宋祁公脩列傳，而志、表乃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分脩。」又元·脫脫等《宋史·劉義叟傳》卷 432（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2838：「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在高昌設置戊己校尉，是漢王朝設置管理機構的起始標誌。東晉咸和 2 年(327)，前涼在高昌置郡，行政建置的一體化，成為中原文化在吐魯番得到確立的標誌，此後的前秦、後涼、西涼和北涼政權，均統轄高昌。隨著內地戰亂，大量的中原漢族民眾遷移河西，復由河西遷移到吐魯番盆地。尤其是北涼沮渠氏的殘餘勢力於公元 442 年占據高昌，並於次年在此建立大涼政權，開啟了漢族文化為主導的獨立王國建置近二百年的歷史<sup>36</sup>。常常被引用的《魏書·高昌傳》記錄北魏孝明帝的詔書稱：「彼之眈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困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sup>37</sup>。」即是明證。中原民眾因為動亂而遷徙到河西地區，形成重視儒學的「河西文化」，其間民眾又進而西遷吐魯番盆地，漢代以來史不絕書。即使到唐朝初年，這種移民趨勢也沒有改變，如前引《舊唐書·高昌傳》：

初，大業之亂，中國人多投於突厥。及頡利敗，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詔令括送，文泰尚隱蔽之<sup>38</sup>。

麴文泰招徠、收留移民的舉動，成為唐太宗滅高昌國的一個原因。而也正是這種移民造成高昌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成就了吐魯番盆地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區域特徵，為〈高昌童謠〉的傳唱創造了條件。根據對吐魯番出土文書姓氏的統計，高昌王國時期漢人占吐魯番總人口的比例高達 70%至 75%<sup>39</sup>。

同樣的，與漢族人口基數的增加同步，從 327 年高昌置郡開始，吐魯番盆地的行政體制也參照中原，與內地政治社會並行發展，最終形成了下引《隋書·西域傳》「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的面貌。

就漢文化的傳入而言，中古時期的史書記載，留下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高昌)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發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sup>40</sup>。

<sup>36</sup> 簡略的回顧，參朱玉麒〈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頁 182-194。相關研究，可參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sup>37</sup> 北齊·魏收《魏書》卷 101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244。

<sup>38</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 198，頁 5294。

<sup>39</sup> 杜斗城、鄭炳林〈高昌王國的民族和人口結構〉，《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1 期，頁 80-86、282。

<sup>40</sup> 唐·姚思廉《梁書·西北諸戎傳》卷 48 (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811。

正光元年(520)，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麴)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肅宗許之<sup>41</sup>。

(高昌國)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大事決之于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sup>42</sup>。

以上記載顯示，高昌國時期的吐魯番盆地流行的文化與中原大同小異，交流的語言，也是《梁書》所謂「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舊唐書·高昌傳》提及即將平定的高昌國時，稱其「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採中國之號焉<sup>43</sup>」，可見，唐代所掌握的高昌國資料，也是一個漢文化背景下的割據式政權而已。

不過，唯一的反調，來自《周書》：

(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子弟，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sup>44</sup>。

其中「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是可以理解的，反映了吐魯番盆地在與中原共同的文化基礎以及漢語為主要通用語之外，作為中西通道上的綠洲國家所具有的多民族聚居，兼備胡語、胡風的多元文化特徵。但是「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的總結，則是矛盾的記載。為此，學者曾從吐魯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國文獻出發，分析當地施行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認為《周書·高昌傳》的「皆為胡語」是「據之傳聞，輾轉抄襲」的錯誤記載，高昌王國與中原內地在語言文字、生活習俗、文化傳承和宗教信仰方面都具有一體性<sup>45</sup>。

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吐魯番出土文書體現的知識傳播方式，都與內地顯示了相同的過程。如北涼寫本《毛詩·周南·關雎序》(66TAM59:4/1)、《毛詩·大雅·蕩之什·抑—雲漢》(2006TSYIM4:2-1—2-4)、高昌義熙(510-515)寫本《毛詩鄭箋》殘卷(73TAM524:33/4-1;33/4-2;33/1-2,33/2-

<sup>41</sup> 北齊·魏收《魏書·高昌傳》卷101，頁2244-2245；唐·李延壽《北史·西域·高昌傳》卷97，略同。

<sup>42</sup> 唐·魏徵《隋書·西域傳》卷83(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847。

<sup>4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高昌》卷198，頁5294。

<sup>44</sup> 唐·令狐德棻《周書·異域傳》卷50(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915；唐·李延壽《北史·西域·高昌傳》卷97，略同。

<sup>45</sup> 陳國燦〈從吐魯番出土文獻看高昌王國〉，《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頁1-9。

2, 33/2-1, 33/1-1, 33/3)、《詩經·小雅·魚藻之什》(Ch.2254r)、晉寫本《潘岳書札並詩殘卷》(甘肅博物館藏)、古寫本班固《幽通賦》注(Ch.3693r+Ch.3699r+Ch.2400r+Ch.3865r)、前秦寫本《五言擬古詩》殘本(Дx.11414r+Дx.02947r)、六朝寫本《晉史毛伯成等詩卷》(Ch.3693v+Ch.3699v+Ch.2400v+Ch.3865v)、六朝寫本《西涼建初4年(408)秀才對策文(75TKM91:11/1-6)、高昌寫本《高昌書儀》(72TAM169:26b),這些出現在唐平高昌之前的經典鈔錄、文學名篇或者應用文本,無論其文書是內地傳來,還是本地傳寫,都顯示出漢文化在吐魯番盆地接受與傳播的實例。特別是其中一些能夠明顯辨析出兒童習字的殘卷如高昌義熙寫本《毛詩鄭箋》殘卷題記、建昌4年(558)前後的《論語》習書(72TAM169:83),可以了解到童蒙學習漢語文的社會氛圍。

從高昌國及其之前的吐魯番文書書寫與傳播者的角度,來作出土文物與傳世典籍記載的「二重證據法」考察的時候,我們後世所能認知的高昌國漢文化背景,也必然早已在唐太宗布將、攻戰的掌握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候騎散播所謂「童謠」而利用高昌兒童傳唱、引起舉國恐慌的歷史時刻,可能早已在唐平高昌的出征之際,已然預備。

## (二) 不可複製的漢語童謠

唐代經營西域以貞觀14年平定高昌為首戰獲勝之後,確立在西域地區鞏固地位的,則是六年之後的貞觀20年征服龜茲、移安西都護府於此而統攝「四鎮」。其征戰之初,《舊唐書·龜茲傳》記載如下:

然臣於西突厥。安西都護郭孝恪來伐焉者,龜茲遣兵援助,自是職貢頗闕。伐疊死,其弟訶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藩臣禮。(貞觀)二十年,太宗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五將軍,又發鐵勒十三部兵十餘萬騎,以伐龜茲<sup>46</sup>。

宣戰、備戰的步驟基本一致,以其「不臣」為討伐張本,布將、盟軍以部署戰爭。其他各書的記載大略相同,如《資治通鑑》記「詔使持節崑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

<sup>46</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西戎·龜茲》卷198,頁5303。

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sup>47</sup>」，其中盟軍機制的介紹更為詳細，以往在平定高昌戰爭中的遊牧部落以及新加入的吐蕃盟軍，組成了強大的包圍圈。戰爭的進行過程雖有所起伏，最終是「勒石紀功而旋」。西征過程中知己知彼的戰術運用，與平定高昌大致是相同的，只是，此後唐軍在西域的戰爭，不再見到「童謠」參與的「妖言」贊助。其重要的原因，是根據唐軍對於兩關之外的西域情報，也只有吐魯番盆地可利用〈高昌童謠〉展開攻心戰術，在其他綠洲國家，那一時期並不具備漢語文化的區域背景和人文基礎。

季羨林先生曾經敏銳地指出：「玄奘是一個非常細緻的觀察家，對語言似乎是特別留心。他所到之處，不管停留多麼短暫，他總要對當地語言、文字的情況寫上幾句<sup>48</sup>。」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大唐西域記校註》的記載，了解唐代經營西域之際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國家的語言情況（表1）：

表 1：《大唐西域記》所載環塔里木盆地綠洲國家語言描述

卷數／頁碼	國名（今地）	語言描述
1／48	阿耆尼國（焉耆）	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1／54	屈支國（庫車）	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1／66	跋祿迦國（溫宿）	文字……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12／983	羯盤陀國（塔什庫爾幹）	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
12／990	烏鑊國（英吉沙與莎車之間）	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
12／995	佉沙國（疏勒）	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詞調，異於諸國。
12／998	斫句迦國（葉城）	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
12／1002	瞿薩旦那國（和田）	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

<sup>47</sup>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 198（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頁 6250-6251。

<sup>48</sup> 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前言」，頁 128。



根據當代語言學家對塔里木盆地發現的出土文獻資料的研究成果，以上這些綠洲國家通行的語言，都無一例外屬於印歐語系中的歷史語言，如：阿耆尼國流行的是吐火羅語 A 或徑稱焉耆語，屈支國則是吐火羅語 B 或徑稱龜茲語，佉沙國的語言可能是某種古代東伊朗語方言如據史德語，瞿薩旦那國的語言也屬於東伊朗語的和闐—塞語或稱和闐語。

所以高昌國在這裡顯示了它的唯一性，正如玄奘對麴文泰的表彰那樣，是「東祗大國之風，西撫百戎之俗」<sup>49</sup>，高昌國是一個以東方中原王國為指歸，而西向影響百戎之國的中繼站。它在對胡俗產生影響的同時，也難免接受其反向的影響，而具有一定的胡俗傾向。但無論如何，在唐軍進入西域之前，兩關之外，高昌國是唯一一個漢文化為基礎的地方；漢語童謠能夠被接受的綠洲，高昌以外，無可複製。

## 五、餘論

〈高昌童謠〉在《新唐書》中的另一個文本，是在〈高昌傳〉中。它與《舊唐書·高昌傳》和《新唐書·五行志》有較大的不同：

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文泰捕謠所發，不能得也<sup>50</sup>。

清人錢大昕曾經注意到這個不同，謂：「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此謠又見〈西域傳〉，而詞小異<sup>51</sup>。」他指出《新唐書》兩見「而詞小異」的現象，但未加評述。

事實上，這種記錄和文詞的不同，仍然具有值得分析的文本意義。《新唐書·高昌傳》所記載的〈高昌童謠〉，在平定高昌的過程中被記錄，完全符合《舊唐

<sup>49</sup>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2。

<sup>50</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西域上·高昌》卷 221 上，頁 6222。羅曰褫《咸賓錄》所載同此，明·羅曰褫著，余思黎點校《咸賓錄·西夷志·高昌》卷 3（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68。

<sup>51</sup>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唐書三·五行志》卷 43（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年），頁 816。

書·高昌傳》作為一種戰術而保留下來的本意；但是文字却發生了很大的改動，這一點，充分體現了《新唐書》傳記寫作強調文學性而擅改歷史文獻的弊病<sup>52</sup>。譬如「回首自消滅」的口語，是童謠體，到了《新唐書·高昌傳》，「幾何」、「殄滅」這樣的書面語也寫進了歌謠，童真俱失。甚至唐人自稱「漢家」而「以漢喻唐」的修辭特點，也在這裡被「唐家」替代。胡三省《資治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sup>53</sup>。」原本容易理解的文句，在宋人「文省事增」的原則下，使得〈高昌童謠〉再次遠離了貞觀 14 年的戰場<sup>54</sup>。

隔世的陌生化，使得《新唐書》在〈高昌童謠〉的書寫上，發生了雙重的誤讀：一是《新唐書·五行志》「詩妖」類中收錄了「高昌童謠」，誤將此童謠的戰爭製造作為高昌國滅亡的天意表現，二是《新唐書·高昌傳》修改了「高昌童謠」，違背了唐代文學修辭的「以漢代唐」的風格。而事實上，正如本文所力求還原的那樣，「高昌童謠」是唐軍利用漢文化思想中的讖謠觀念，在平定高昌戰役中製造的心理戰術。

《新唐書·五行志》誤收了〈高昌童謠〉，恰好幫助我們認識到它被製造出來並引起恐慌的民眾心理基礎——在漢文化背景下，神秘的預言無論真假，往往被賦予不可違背的天機。正是「日月照霜雪」的形象比喻，使得高昌王國在開戰之前，心理防線先自奔潰下來。

<sup>52</sup> 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22-23。

<sup>53</sup>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42，頁739。

<sup>54</sup> 相關細節表述，可參朱玉麒〈唐代經營西域的民間文學遺產〉，《民族藝術》2023年待刊。

## 主要參考文獻

- 漢·司馬遷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北齊·魏 收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姚思廉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令狐德棻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
- 唐·魏 徵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玄 奘、辯 機著，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唐·慧 立、彥 棕著，孫毓棠、謝方點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後晉·劉 昫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王 溥 《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 《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宋·歐陽修、宋 祁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 宋·郭茂倩編 《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宋·趙彥衛著，傅根清點校 《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元·馬端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 《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元·脫 脫等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羅曰褱著，余思黎點校 《咸賓錄·西夷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清·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董誥等編 《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清·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
- 王 素 《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田餘慶 〈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歷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131-150。
- 朱玉麒 〈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輯，頁129-148。

- 朱玉麒 〈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頁182-194。
- 《瀚海零縑：西域文獻研究一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吳玉貴 《唐書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杜斗城、鄭炳林 〈高昌王國的民族和人口結構〉，《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頁80-86、282。
- 張廣達 《張廣達文集：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陳國燦 〈從吐魯番出土文獻看高昌王國〉，《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頁1-9。
- 黃永年 《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 游自勇 〈中古〈五行志〉的史料來源〉，《文史》2007年第4輯，頁77-91。
- 〈「棄常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災異書寫〉，《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頁55-77。

# STUDIES ON DUNHUANG

## VOLUME 39

YAMAMOTO Takako, The Way of Editing Shuyi and Writing Letter

ZHU Yuqi, “Gaocang Tongyao” and the War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YU Zhao, The Origin and Sacred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lking Monk in Dunhuang Xing Jiao Seng Art

LIN Jenyu,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unt Wutai Hymns” of the Manuscripts’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MA Xiaohe, Daēnā and Lightning Buddha

LIU Tanch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ekayāna” in the Yichengyi Literature of the Dunhuang Dilun School

HIROSHI Arami, *The Wizard Yeh Ching-neng* and Ye Jin-neng

ZHANG Xiaoya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Zi Cheng Dao Jing* and *Xi Da Tai Zi Xiu Dao Yin Yuan*

LU Suilien,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ream” in Dunhuang Bianwen

WANG Sanching, Meditation after Reading Yang Xiuqing, *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Dunhuang Peop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Book Review]

2023.08